

丝绸之路

服饰研究

李肖冰 著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服饰研究

李肖冰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服饰研究/李肖冰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8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ISBN 978-7-228-12734-4

I. 丝… II. 李… III. 丝绸之路-服饰-研究-中国 IV.
K87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138714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3652362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42.50 元





出版说明

形成于中国历史上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①。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为我们揭示出东西方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纵观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它不仅凝结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而且汲取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精神文化成果。可以说,“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高度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古代中华文明”^②。

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考察合作项目——《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共计13卷。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时出版经费短缺、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主编周菁葆、陈重秋先生的不懈努力,出版社要出版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一版)的出版,不仅为国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也推动了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10年过去了,伴随着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发现和丝绸之路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为了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在丝

① 林梅村著:《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32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绸之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2008年年初,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二版)。丛书编委会在第二版中除了保留第一版已出版的8种选题之外,又从中国已出版或待出版的研究成果中,遴选了20余种有代表性的选题列入丛书,计划分批推出,陆续出版。这批研究成果,以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为主线,注重突出学术观点的创新性和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内容涉及考古、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等多学科领域。由于入选的已出版研究成果在出版时间上跨度较大,此次再版前均由作者对书稿内容做了全面修订,有的甚至做了重大修改,补充了新的资料,借鉴了新的研究成果和观点。

为了使读者了解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进展情况,我们特邀请中西文化交流史著名学者、苏州大学教授沈福伟先生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为丛书撰写了序言。文中的精辟论述和真知灼见,是读者开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二版)的一把钥匙。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二版)的编辑出版,自始至终得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关心和支持。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对丛书选题的书稿进行了学术评审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从而保证了丛书的学术质量。由于编者学术水平所限,丛书在编辑中难免挂一漏万,有所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9年6月6日



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

(总序一)

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

丝路学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的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丝绸之路最早是19世纪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的欧洲探险家提出来的,在当时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西部地区在古代曾经呈现过的多元文化的一种重新发现,也可以说是历史上这些由多民族创造的文化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得的认同。它之所以产生在中国社会处于大转折的时期,是具有深层次原因的。19世纪中叶,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从此进入了丧权辱国、危机四伏的国难时期。英、俄等欧洲列强首先对中国西部边疆实行蚕食政策,掀起了一股以地理考察为名的探险热。当时走在这股热潮前列的是德国巴登—符腾堡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68年李希霍芬接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第二次到中国考察,到达上海后,受英国商会委托,对中国地貌和地理首次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足迹遍及当时18个省中的15个省,还到了东北(满洲),摸清了中国的资源和开发的前景。1872年返回德国后,出任柏林大学校长,当选为国际地理学会会长,致力于写作5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s 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1877—1912年, 5 vols.),到去世前出版了1、2两卷。他从亲身的考察和得到的历史资

料中发现,古代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令后世赞叹和瞻仰的遗迹和文物。

李希霍芬的偶然发现,在以后半个世纪中竟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这和中国领土受到西方列强的蚕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受到李希霍芬的影响,他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追踪他的足迹,先后7次到中亚和中国西部进行地理考察和考古发掘。差不多同时,俄国人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Nicholas Przwevalsky)和奥勃鲁契夫(Obrochev)、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 Stein)、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lbert Gr ü nwedel)和勒·柯克(Le Coq),先后率领探险队,在世纪之交进入中国新疆和西部地区。他们在楼兰古址进行田野发掘,堂而皇之拿走了新疆石窟寺院中的彩塑佛像,将尘封已久的吐鲁番盆地的古物成箱运出中国国境。他们还设法进入了敦煌石窟的藏经洞,攫取了前所未闻的精美壁画、塑像、铭记、经卷和丝织品。原先保存在石窟寺和遗址中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成了伦敦、巴黎、柏林、新德里和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也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莱比锡)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论证。后来由赫尔曼在他编著的《中国历史商业地图》(哈佛燕京学社,1935)一书中加以宣扬,从而使丝绸之路为世人所熟知。

平心而论,丝绸之路原本只是对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历史毫无所知的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当时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在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由于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当时欧洲人设计的西方文明框架,是以地中海世界为主体的一大文化圈,将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古文明一一囊括入内,并称其为“中东”,剩下的东亚(欧洲人称为“远东”)和中亚(欧洲人称为“突厥斯坦”),无非是西方文明东扩的支脉而已。可见在国家丧失主权以后,学术无法自主的情况下,文化的研究、历史的阐释要取得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

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走的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所以在阐释东亚文明的形成过程时出现了以上各种各样的,从人种到文化全都来自西方的说法。尔后50年,不仅仅是由于丝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更多的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得力于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考察,有了极其巨大的进展。由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这样的研究,是在中国学术界取得自主权的同时才开始的;这样的研究一旦启动,在当时便具有了国际合作的特点,迎来了丝路学研究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先前已五次来华进行地理考察与探险活动,在国际上声名显赫的斯文·赫定,会同在中国政府部门工作的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德日进等中外科学家共同发起的。由于这样的共识,1927年经过南京政府核准,在北京由中国和瑞典双方合作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科学考察团由徐炳昶任中方团长,斯文·赫定担任瑞典团长,从北京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经过河套、宁夏,奔赴新疆哈密、吐鲁番,抵达乌鲁木齐。1930年10月科学考察团调整阵容后,扩大到调查楼兰古道和罗布泊,测绘塔里木盆地,考察甘肃古迹和戈壁沙漠,还到内蒙古进行民族学调查,去川藏边境考察动植物。考察工作在1935年告一段落,作为总结,斯文·赫定在同一年用英文出版了《丝绸之路》一书。科学考察团搜集到大批的资料、标本、简牍、石刻、壁画和各种古文字的文书以及丝织品,第一次实现了在中国政府监管下对丝绸之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为中国学术界建立丝路学,给今后以中国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开展多元文化研究,构筑了中外科学家相互交流的平台。

丝路学研究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进入第二个高潮。在1959~1975年间,由新疆博物馆和吐鲁番文管所牵头,对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系统的发掘,获得了上万件极具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文书,在1992年出版了10卷本《吐鲁番文书》的释文。在这段时间里,卷帙浩繁的敦煌学已从丝路学的分支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1983年8月成立的敦煌吐鲁番学会,标志着自提出丝绸之路到丝路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已经走过了最初的一百年。其中最后的50年,经过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奋进,终于扭转了“丝绸之路在中国,丝路学中心在西方”的那种令中国人陷于丧失民族自尊的窘境。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就是中国学者在丝路学这一研究领域所推出的部分成果。

丝绸生产技术是6000年前人类文明史中极具工艺价值的一项伟大发明,它诞生在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根据考古发现,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交流大约进行

了2000年之后,像波斯、拜占庭这样的文明古国,才从中国学到了从养蚕、缫丝到纺纱、织锦的全部工艺流程。因此丝绸之路提出的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丝路学的研究,也必然是一项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取得丰硕成果的研究。这算是我在这套丛书出版时的一点感想,写出来供各位专家学者探讨。

沈福伟

2009年3月10日于苏州大学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总序二)

欧亚大陆上不同区域的人群在史前时期就有往来迁徙活动，高加索人种至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中国文明在其诞生之始就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在当时条件的许可之下参与各种文明的交换与交流。中国境内不同地区文明的融合以及华夏文明与异域文明的交流，对于塑造中国文明的基本面貌都有重要作用。

文献记载表明，先秦时期的黄河流域就与葱岭以西地区有较牢固的联系，而遥远的古希腊也具有对远东地区的模糊认识。昆仑山玉石的东输对于中原玉文化的兴盛有非凡作用，斯基泰人的东迁南下对于中亚和南亚的人种与文明有着深刻影响，两者更表明中原与西方的交通道路在远古时期便实际存在。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就在今天阿富汗市场上发现了绕道印度而来的中国四川地区的纺织品和竹木制品，可见，汉代中国政府开辟丝绸之路和经营西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远古交通道路的重新认识和拓展，但更重要的意义是中原地区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外部世界并延伸本土文化的活动空间。此后各朝政府都延续了这种对外交往的传统，并于唐代达到顶峰，从而形成了地中海地区、阿拉伯地区以及波斯、中亚、南亚、东亚往来互通的交流格局。西方各地区的文化汇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更新的重要动力，中国的特产渐次西传，在很多方面影响了西方诸地的生活习惯。元代的欧亚大陆交通达到空前畅通，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创造了良好条件。

丝织品名副其实为中国的独特创造。考古工作者在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和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都发现了丝织物,意味着中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蚕丝织物的生产。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则与丝绸有密切的关系,以致后世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交流通道通称为丝绸之路,而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的产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春秋战国之际,东西方之间已经沿着如今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欧亚大陆交通路线开展丝绸贸易。被认为写于公元前5世纪阿契门尼德王朝统治下的波斯(the Achaemenid Empire of Persia)的《旧约·以西结书》(Ezekiel, 16:10; 16:13)有一段提到耶和華為耶路撒冷城(Jerusalem)披上最美丽最豪华的衣裳。耶和華在形容世间最美丽的织物时两次提到“丝绸”。这意味着此时的波斯帝国境内已有中国丝绸。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和色诺芬(Xenophon)也说波斯人喜爱米底亚(Medea)式的宽大上衣,而此种衣物的材料正是后来被希腊人称为“赛里斯”(Seres)的中国丝绸。这种轻薄衣料的来历令希腊人浮想联翩,如猜疑出产于羊毛树上,或推测得之于蜘蛛腹中。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同一时期丝绸也已传至欧洲,因为所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希腊雕刻和彩绘人像所穿衣服都极为稀薄透明,似为丝绸面料。汉唐时期,丝绸不仅是北方陆路交通线上的主要贸易品,也是中国政府赐赠西方国家的主要礼品。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丝绸还未成为主要贸易商品之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存在。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的出现正是这种交流存在的具体表现,它们可谓丝绸之路的前身。草原之路通常是指始于中国北方,经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脉(Altay)、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的通道。这是古代游牧民族经常迁徙往来的通道,来自东欧的印欧语系民族斯基泰人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就是沿此通道由西而东并南下印度或东南行至阿勒泰地区。绿洲之路是指位于草原之路南部,由分布于大片沙漠、戈壁之中的绿洲城邦国家开拓出的连接各个绿洲的一段段道路和可以通过高山峻岭的一个个山口,这条通道逐渐成为欧亚大陆间东西往来的交通干线。据说周穆王西巡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虽说穆天子的故事未必真实,但考古发现已将这条道路的出现时间追溯到远早于周穆王的时期。尽管自中原通往中亚以及西亚、南亚、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方的贸易通道在很早以前就已自然地存在,但其真正的辉煌与繁荣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体现,则始于汉唐时期。从此,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同时,中国也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世界。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正式拉开。

说道中西文化交流,还不能不强调西域。

西域是一个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历史地理概念。所谓西域,通常是对阳关、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的统称,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并且不

同历史时期的西域所指的地理范围也不尽相同。

汉代的西域,狭义上是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即后来西域都护府统领之地,按《汉书·西域传》所载,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广义上的西域则除以上地区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乃至更西的地区,事实上指当时人们所知的整个西方世界。与唐代的西域概念相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西域是一个范围不断变动的地理区间。随着唐王朝势力向中亚、西亚的扩展,从前汉代的西域变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辖控之地,并因推行郡县制度、采取同中原一致的管理政策而几乎已成为唐王朝的“内地”。西域则被用来指安西和北庭以远的、唐王朝设立羁縻府州的地区,具体而言就是中亚的河中地区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亚、南亚地区。但西域的政治军事功能与汉朝相同,都是作为“内地”的屏藩,并且在两汉与匈奴的斗争、唐朝与阿拉伯人的斗争过程中,各自的西域地区也确实起到了政治缓冲作用。唐朝广义的西域概念也比汉朝有所扩大,随着当时对西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而在汉朝广义西域概念的基础上继续扩展至地中海沿岸地区。

丝绸之路研究所讲的西域,指的就是两汉时期狭义上的西域概念。该地区在两汉时期是多种族、多语言的不同部族聚居之地,两汉政府并未改变该地区的政治结构,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其作为中原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屏障。从地理位置看,狭义西域即塔里木盆地正处于亚洲中部,英国学者斯坦因(M.A. Stein)将其称为“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可以说是非常形象。它四面环山,地球上几大文明区域在此发生碰撞。不过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并未使其与周围世界隔离,一些翻越高山的通道使它既保持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又得以利用自然的优势免遭彻底同化。上述地理特征也造就了西域地区作为世界文明交汇点的文化特征,波斯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在这里汇聚。而在充分吸收这些文明的同时,西域并没有被这些文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形成适合本地区的多元文化。在这里可以找到众多古代文化的影子,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西域文化的个性张扬,这正是西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西域并不同于西方。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是一个特别具有异国情调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方位名词,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就地域而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随着历史步伐的演进而转移,大致在明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方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然而中国人观念中的西方在文化上始终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异域文化。对于西方世界(绝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异域外邦的意识,西方从来都是一块代表非我族类之外来文化的神秘地方。

用现代概念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有一个东亚世界和西方世界(绝域)的观念。东亚世界笼罩在中国文化圈之内,是中国人“天下”观的主要内容。在东亚世界

里,古代中国的国家政策以追求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满足。对于东亚世界的成员,只要接受中华礼仪文化,就可以被纳入朝贡国的地位,否则就有可能兵戎相见。因为古代国家的安全观,乃是以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同与异来确定,文化上的认同是界定国家安全与否的关键因素。这样看来,西域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观念中既可视作“天下”的边缘地区,又可视作“天下”与“绝域”的中间地带。这也正是西域的独特性所在。

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第二版),我看了丛书选目录及其作者,大都是能体现丝绸之路研究学术特色的上乘之作。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能够看到即将有如此众多的成果问世,由衷感到高兴,应约写下如上文字,权当为序。

张国刚

2009年3月23日于北京清华园



前言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丝绸之路中段,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处。这块广袤、神奇、不可分割的祖国大地一直是中国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各族人民生活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内,共同开发、守卫着祖国的西部大门,共同创造着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创造了灿烂的具有新疆多民族特色的服饰文化。

服饰的创造是人类迈向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人类服饰文化的历史与人类生活紧密相随,始终相伴。考古人员曾在新疆辽阔的大地上,发现了早在遥远的旧石器时期人类活动的某些线索,所见古代人类遗址、遗迹较多的是中石器时期。在哈密七角井等细石器文化遗址,发现了古人用燧石打制的船底形、锥状形石核、石镞、石钻头、指甲盖形刮削器等石器。这些物件,表明了使用石器的主人为了从事采集、狩猎等活动,开始启用石镞、刮削器捕获猎物,处理毛皮,用兽皮保暖护体。

丝绸之路上的西域服饰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正由于它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且展现出浓郁的民族衣饰风格,才使它独树一帜,别具风采。

一部西域服饰文化的著成,应涵盖从古代到近代各族人民巨大的创造性。每一处墓葬出土的衣冠服饰珍品,每一幅壁画人物衣饰的穿着,以及雕刻衣装的草原石人、岩画、木雕、泥俑、塑像等人物的衣冠服饰造型,都足以说明西域服饰有着悠久的历史,记载着它的兴衰,凝聚着先民的精魂。诚然,我们难以认定衣饰形式的确切年代,但却可以据此追溯到它的童稚时期,那经历了从人类混沌意识中的原始阶段,逐渐过渡到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始,在天山南北各地发现的大量岩画,反映了这些地方曾经是远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纵观岩画的内容,绝大部分反映了古代初民的狩猎生活,它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由野牛、野驼、虎、鹿、大角羊等组成的动物世界,作为这个世界的主人生活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野林。岩画的出现传递着原始

人类的生活信息,是凿刻在岩石上的“史书”,再现了原始先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风貌。在早期岩画中,狩猎者头插羽毛或装扮动物的尾饰,多半是裸体的,后来渐渐以兽皮御寒,兽皮是在捕获兽类之后才被利用。我国古籍记载了人类早期衣兽皮或草叶的情况。《礼记·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书中印证了原始先民衣原生兽皮,茹毛饮血的史迹。

新疆考古的不断发现,使深埋地下的古代遗存不断被发现,开启了了解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通道。出土于铜石并用时代的一枚“骨针”、一把“骨梳”,为古代新疆原始先民创制以兽骨磨制骨针、骨梳的事实做了有力的佐证。这枚小小的骨针,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的功能在于缝缀兽皮,将兽皮分成条状或连缀成片,用粗齿状的骨梳梳理毛皮,使之初具衣着形式。骨梳的创制为今后毛纺衣饰奠定了基础,继而又出现了“石纺轮”,运用动物的毛作原料,纺成毛线,是西域先民的发明创造,使衣饰原料向前发展了一步。

考古工作者在古墓葬中寻到了史书中极少记载的新疆古代衣冠服饰的实物。衣冠出土于大约距今4 000年前罗布泊铁板河古墓葬,是新疆迄今为止发掘的最古老的衣冠文物。称其为冠,是因古尸头上戴有的一顶毡质尖顶形插羽毛的帽冠;衣服则是因为它初具上衣模式,是一件粗纺毛线织成的“披风”,它裹在古尸身上,前胸用自制的木针别住,起着原始“纽扣”的功能。“披风”应是人类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原始着装样式。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隅的且末扎洪鲁克古墓,墓葬年代约为3 000年前,出土的两件自纺毛质衣袍已经具备衣饰形式。它发端于生活需求,孕育于独特地理环境,缝制了以纺织粗毛布为面料的、具有御寒性能的、较“披风”更为复杂的衣饰形式,是原始初民开辟的属于自己的服饰文化天地。

毛质衣袍的发现,尽管时隔数千年,却令人感受到西部边陲先民们对于生命的强烈渴求,蕴含着古代某种生活氛围和对于自身服饰创造价值的肯定,诸如哈密五堡古墓与山普拉古墓出土的毛质服饰,都证实了先民创造衣冠服饰的进步是惊人的。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日益发达,青铜器制造的传播和使用曾把草原文明推向一个崭新阶段。毛纺织业逐渐普及,毛布衣袍不仅御寒保暖,且毛质纯厚,款式更趋完善。古代的游牧人习于骑马、涉水草、跨雪山。所谓“胡服”的衣着形式则以衣裤为主,即上身着褶、下身着裤,称曰“裤褶服”。《急就篇》曰:“褶为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赵武灵王推广胡服,为便于作战需要,改变宽衣博带式的汉装,是历史上服装改革的先驱,其改革意义深远,服饰流传较广。

丝绸之路凿通之后,中国丝绸传入西方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便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东西方文明史揭开了

崭新的一页。丝绸之路地处亚欧腹地,地理位置举足轻重,于是,驾驭着一队队骏马、骆驼,背行囊、贩运丝绸服饰的东西方商人往来于这条闻名于世的古道上,推动了不同服饰文化交流。由于它们互相借鉴,互相渗透,使西域地区的服饰文化形成一种呈现诸多因素的多元格局。

汉代,西域即隶属中国版图。汉朝于公元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行使对西域的管辖权。两汉对丝绸之路的保护,促使了丝绸之路空前繁荣。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西域服饰的精美。仅以一件国内罕见的汉代锦袍为例,足以说明它的价值与影响。此锦袍出土于民丰县尼雅遗址(尼雅遗址是古西域著名的精绝国所在地),衣袍面料显现绛、绿、紫、淡蓝、纯白色,夹饰茱萸纹、云纹图案,镶饰“万事如意”铭文。这件彩色锦袍光艳夺目,呈现了汉代织造、染缬工艺的高超、精湛,服饰形式则是西域居民的窄袖衣款式。面料质地的精良与衣饰形式的完整,使“万事如意”锦袍成为国宝级的服饰文物。锦袍是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结晶。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时期,战争频繁,人口流动性极大。西北各族迁往中原,内地百姓流入西域,他们的接触与交往使西域窄袖、紧身的裤褶服被中原、内地等地区所借鉴。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封建文化进入鼎盛时期。胡服、胡装日趋华丽,成为当时世俗社会时髦的装束。“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描述了中原人穿胡服的情景。高昌回鹘汗国石窟壁画人物造型与出土绢画,展示出西域贵妇或供养人穿着汉人大袖襦锦袍的形象。服饰的交流与融合使得服饰文化各具特色,大放异彩,使世人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服饰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晶,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

宗教文化的传入给西域文化输入了新的血液。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传入西域,沿着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逐渐在天山以南、银山以西的城邦诸国绿洲建窟造寺。佛教源于印度,佛窟壁画人物造型以及衣冠服饰则受中国中原文化、印度、希腊、波斯与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西域画师则以西域人及其着装为原型,融东西方造型为一体,创造出壁画人物造型及衣冠穿戴,展现出无比绚丽的历史画卷。

西域气候变化无常,风沙肆虐横行。但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却未能阻隔“猎奇”的域外人。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探险为名的外国探险家,不远万里来到西域,劫走许多珍贵文物。这些珍品被陈列在异国的“博物馆”,成为世人瞩目的传世宝物。参观者无不被一幅幅以西域居民为原型的壁画人物造型、华贵绚丽的衣饰色调、圆润流畅的曲线、独具特色的衣饰款式、风格各异的发式、轻薄如蝉翼的多彩披纱、曳地罗裙产生的巨大魅力所吸引,并从中领悟东方造型艺术与颇具特色的衣饰内涵。

公元9世纪中叶,回鹘人迁入高昌并建立政权,到13世纪初叶成吉思汗征服蒙古各部,统一天山南北。这一时期的回鹘服饰为窄袖对襟袍服,边缘绣饰纹样,趋于华丽;蒙古装则以辫线袄为主,头戴钹笠冠。近现代各民族服饰千姿百态,风